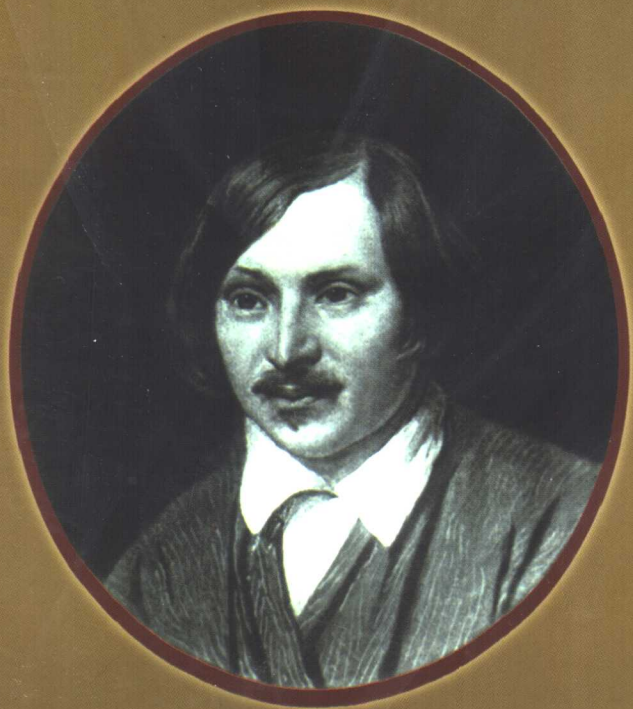




尼古拉·果戈理

[俄] 米·赫拉普钦科 著
刘逢祺 张捷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尼古拉·果戈理

[俄] 米·赫拉普钦科 著
刘逢祺 张 捷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尼古拉·果戈理/(俄)赫拉普钦科著;刘逢祺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8

ISBN 7-5327-2452-2

I. 尼... II. ①赫... ②刘... III. 果戈理(1809~
1852)-小说-文学评论 IV. I5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0127 号

М. Б. Храпченко

НИКОЛАЙ ГОГОЛЬ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ПУТЬ, ВЕЛИЧИЕ

ПИСАТЕЛЯ

本书根据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1,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80 年版译出

©此中文本的翻译出版获作者授权

尼古拉·果戈理

[俄]米·赫拉普钦科 著

刘逢祺 张捷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同济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2.75 插页 2 字数 526 000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4,000 册

ISBN 7-5327-2452-2/I·1432

定价: 33.50 元

目 录

第一章	果戈理和他的时代	1
第二章	《狄康卡近乡夜话》	87
第三章	《密尔格拉得》	143
第四章	彼得堡故事	225
第五章	戏剧作品	285
第六章	《死魂灵》	396
第七章	《死魂灵》(续)	475
第八章	思想危机及其根源	571
第九章	创作方法	599
第十章	果戈理与俄罗斯文学	626
第十一章	果戈理的文学遗产在二十世纪的命运。果戈理创作的世界意义	687

第 一 章

果戈理和他的时代

—

在俄国和世界文化的杰出活动家当中，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占有光荣的地位。作为一位艺术语言的天才大师，他创作了许多以其形象的深刻性和真实性，创造性地概括生活的力量，以及艺术上的完美而令人倾倒的伟大作品。

果戈理受到人具有崇高使命的思想的鼓舞，是猥琐和庸俗、利己主义和唯利是图的形形色色表现的不可调和的对手。作家勇敢地大声疾呼，愤怒反抗奴隶般的生活和社会不公。他无情地揭露社会的因循守旧和思想的保守，对于那种忘却人类生活道德准则的现象进行严厉的批判。作家以惊人的力量描写人民英雄，描写他们精神面貌的美和他们有历史意义的事业的伟大。

果戈理那些以现实主义和民主的人道主义原则为基础的艺术作品，对于社会的自我意识，对于俄国和其他国家精神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创作在进步的社会思想发展中，在社会革命力量的形成中，是一个重要的、有积极作用的因素。车尔尼雪夫斯基当年就关于《钦差大臣》和《死魂灵》的作者写道：“他在我们心中唤醒了对我们自己的认识——这就是他的真正

功绩。”^①

果戈理创作的作品，通过揭示现实生活中各种现象的真正意义，过去培养、现在仍在培养热爱自由和正义的高尚感情，培养对于猥琐生活，对于社会的恶，以及对于人的自私自利的欲望和行为愤怒、鄙视的感情。

果戈理的文学活动有着思想上和创作上的矛盾，这在他生活的晚期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些矛盾过去和现在经常被用来对果戈理的生活道路、文学道路及其艺术遗产作公然保守的解释。但是这种解释往往同真实情况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果戈理创作活动的基本方向并不发源于这样那样地表现在他作品里的错误观点，而发源于在他作品中如此鲜明地表现出来的进步的 and 解放的思想。决定作家创作内容和实质的，不是偏见和迷误，而是深刻的生活真实和作出的出色的艺术发现。

果戈理的现实主义杰作是对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宝库的巨大贡献。作家作出的艺术概括已成为整个进步人类的财产，引起了各个不同民族读者的极其浓厚的兴趣。果戈理大胆地确定了新的创作原则，这些原则对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在俄国和其他国家的优秀作家的作品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果戈理创作概括的惊人力量是以作家同生活的密切联系为基础的。他从生活的演变中，从生活的深处汲取了灵感，也汲取了自己作品的丰富内容。果戈理是一位具有巨大社会热情的艺术家，他密切地注视着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过程。而且他不是作为一个漠不关心的观察者，而是作为一个公民，一个深切关心民族、国家和世界上所有人的命运的人这样做的。为了解作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三卷，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一九四七年版，第二十页。

家创作的思想和艺术特点,必须弄清他同这个时代的历史现实与文学运动的联系。

大家知道,许多伟大作家的作品,就其内容的深刻性和艺术形象的意义来说,远远超出这些作品问世的那个历史时代的界限。许多最著名的艺术作品都是千百年来经久不衰的,它们引起历代读者的兴趣,给他们以美的享受。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杰出的语言艺术家们的创作概括所阐明的是全人类的问题,能够帮助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了解许多彼此极不相同的生活现象。

每一个新的时代都以自己的方式评论作家,并在他们的作品中接受与这个时代接近的艺术原则。文学现象的历史存在极为复杂。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在对一个作家及其作品普遍感兴趣的时期之后,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里,这种兴趣就降低或消失了。尽管如此,在这个时期内,常常发生古典作品的艺术潜在力量逐渐展现的过程。这种潜在力量所以产生,起决定作用的是艺术家的才华和个性,是他同现实生活的联系。正因为如此,弄清作家在生活演变中,以及在社会和文学的发展中的地位不仅对于了解他的特殊性,而且对于说明他的创作的命运都是极端重要的。忽视对艺术遗产持历史主义态度,就会产生主观主义、各种任意的论断和“观念”。

显然,研究者从历史的角度研究文学现象时,不可能脱离他那个时代、他那个社会环境中所存在的思想标准和审美标准。然而,如果这些标准不是狭隘的,并且就其实质来说是进步的,那么它们就可以使研究者更深入地说明和更充分地掌握过去的文学。毫无疑问,现代审美标准无论如何不能、也不应该作为对过去文学进行评价的直接出发点。问题在于,为把对文学现象的现代认识考虑在内,就能有一种历史视角,通过它有可能在文学遗产中看到并了解到,长期以来以及在当今仍然具有生命力

的东西。在这种条件下,对于大作家的作品的历史主义态度是同现代对这些作品的解释交织在一起的。所有这一切对于研究果戈理的创作,研究现实生活的各种现象对他创作的影响,以及他的创作在社会意识和审美意识发展中的作用都有直接的关系。

果戈理生活和进行创作的那个时代,是以重大的社会变动为标志的。作家的童年时代(他生于一八〇九年)恰遇粉碎拿破仑的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和俄国登上广阔国际舞台这样的重大事件。青年时代,即果戈理学习的年代,是十二月党人酝酿用革命方法改造俄国的计划,然后公开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的时期。果戈理是在残酷的政治反动时期登上文坛的。他的创作活动是在三十和四十年代开展的,那时尼古拉帝国的统治集团力图根除一切自由思想和一切造反的意图。

就在这个时期,人们也关切地以批判态度认识社会现实生活的各种现象,社会的积极力量逐步形成并得到了发展,创作了一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化珍品。许多先进人物执著地探索社会发展的新道路。A. 赫尔岑把十二月党人以后的时代叫做“表面顺从,内心解放”的时代。他在《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一文中写道:“……在国家的内部进行了伟大的工作,这工作是默不作声和无言的,然而积极和不间断的;不满情绪到处在增长,在这二十五年革命思想的传播比过去一百年传播得还要广泛,然而这种思想并没有深入到人民当中去。”^①

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的特点,是“旧”制度危机的加深。从内部削弱农奴制的资产阶级关系的发展,是这种危机的经济

① 《赫尔岑文集》(三十卷集)第七卷,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二一一页。

基础。与此同时，逐渐脱离自然经济的趋势，以及市场关系对农村、对地主整个生活方式的影响，导致对农民的社会压迫和经济压迫的加强。地主企图增加自己庄园的收入，采取新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法；急剧加强劳役制，剥夺农民的土地以扩大地主的耕地，并且提高代役租的价格。农奴主的剥削的加强，激起了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

一八二六年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当时在人民当中广泛流传着一个传说：农民将获得土地，并将免除税赋和徭役。尼古拉一世匆忙发布上谕，宣称“凡属国家农奴，可不缴纳税赋……而农奴和家仆可不服从其主人之传闻，纯系居心叵测之徒捏造散布之谣言”，凡继续犯上作乱者，将给以最严厉之惩处。

一八三〇至一八三一年两年，由于霍乱病蔓延，俄国各地掀起了农民起义浪潮。所谓“霍乱暴动”，就是反抗农奴制的一种特殊形式。霍乱的流行引起了民众对现存制度的强烈不满。II. 维亚泽姆斯基就此写道：“从流传到平民当中的各种传闻中可以看出，他们在霍乱中所发现的主要是政治疾病，而不是自然疾病，而且把这个时期叫做革命。”^①

一八三〇年夏，塞瓦斯托波尔发生了大规模的起义。这次起义的原因是人民对自己的痛苦状况深感不满。起义时，军事长官斯托雷平和许多军官被击毙，这一事实可说明事件的规模。

一八三一年七月诺夫哥罗德省军屯户的起义是那个年代的一起重大事件。共有十二个团参加了起义。军屯户遭受兵营内和农奴制劳动的双重压迫，他们这种特别艰难的处境是这次起义的原因。起义的人们说，应该“把贵族统统杀死”。甚至屯垦军团的长官埃伊列尔将军也不得不承认：“霍乱和灾祸只是促使

① 《维亚泽姆斯基全集》，第九卷，圣彼得堡，一八八四年版，第一四六页。

民众闹事的借口，暴动的真正目的是希望摆脱军事状态。”军屯户的骚动引起了沙皇政府的严重恐慌。宪兵头子本肯多夫惊慌地写道：“几乎就处在京城门口的军屯户所表现出来的极有害的后果和农民中根深蒂固的对自己地位的不满，不能不特别注意。”^①

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农民运动大大加强了。一八三九年，农民骚动遍及十二个省。一八四一年，格鲁吉亚的农民起义具有巨大的规模，这次起义遭到了特别残酷的镇压。在白俄罗斯，四十年代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在“第三厅”给沙皇的关于“社会思想倾向”的年度报告里，系统地重复这样的思想：民众当中的不满和对自由的渴望增强了。“自由的思想在农奴当中一年一年扩大和加强。一八三四年，有许多农民不服从地主的例子……现在，所有这些情况都是彼此分开的，互相之间没有任何共同联系……但是可能出现不利的情况——外部战争、疾病和缺衣少食；有人可能会产生利用这种情况危害政府的极有害的思想，到那时，只要宣布他们的自由不再为地主所占有，就会很容易地造成大的祸害。”^②一份秘密报告指出：“现在，平民百姓远不是二十五年前的了……人民的整个精神都集中于一个目的——求解放……总之，农奴的状况是国家底下的火药库，而更危险的是，军队是由农民组成的。”^③

俄国社会矛盾的增长是同西方巨大的社会变动，同资本主

① H.K. 希利杰尔：《尼古拉一世皇帝》，第二卷，圣彼得堡，一九〇三年版，第三七二页。

② 《一八二七——一八六九年的农民运动》，第一卷，国家社会经济书籍出版社，一九三一年版，第十五至十六页。

③ 同上，第三十一页。

义及其所固有的内部冲突的急剧发展同时发生的。尽管俄国和西方许多国家社会制度不同,但是在这个时期,它们之间不仅在国家和经济方面的联系,而且在文化方面的联系都在不断发展。俄国的先进人物同守旧的活动家一样,都在密切地注视着西方的社会政治生活,注视着他们的政治思想、哲学和文学的发展。西欧的社会经验和思想潮流(同俄国的现实生活,同俄国的文化发展相对照)引起各个不同的社会集团的兴趣,自然,评价是各不相同的。在接受西欧各国的社会科学思想和文化的成就的同时,也常常同在西方得到传播的社会政治的、哲学的思想和思潮发生论战。由于对俄国社会发展的道路,对西欧的社会经验,以及对西方在教育领域的成就的评价各不相同,这时就出现了作为社会政治思潮的斯拉夫派和西欧派,它们内部不断发生分化。当然,时代的精神生活绝不仅仅限于这两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所具有的思想和观点的范围。它要广泛和多样得多。时代的精神和道德氛围,是在已成为社会进步力量真正关心和探索的中心的文学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下形成的。

二

上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在各种不同的社会思潮和文学派别之间所发生的紧张的思想冲突当中,某些作为支柱的基本点似乎确定了。这就是:作为文学的息息相关的原则和最重要因素的人民性问题,个人和个人因素的作用问题,对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评价问题,历史主义在理解当时的过程中的意义,以及在注意其他国家社会发展的同时确定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其中每一个问题都不是与其他问题分开讨论的,而是彼此处于一定的联系之中。

这时统治阶层和社会反动集团的代表人物都非常积极地阐

述民族性思想,这种情况是反常的。他们创造了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后来取名“官方民族性理论”。其作者之一就是教育大臣C.乌瓦罗夫,B.别林斯基以充分的根据管他叫“俄国取消和削弱教育的大臣”。乌瓦罗夫声称:“我的工作不仅是监视教育,还要监视一代人的精神。如果我能使俄国推迟五十年发生各种理论为它准备的事情,那我就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可以死而瞑目了。这就是我的理论;我希望,我能做到这一点。我具有做到这一点的良好的愿望和各种政治手段。”^①

乌瓦罗夫和其他反动思想家希望巩固现存秩序的“阵地”,顽固地企图给社会意识,特别是青年一代的意识灌输一种信念,使之相信“真正俄国的东正教、专制制度和民族性的守旧的原则,这些原则是我们得救的最后依靠和我们祖国的力量、威严的最可靠保证。”^②把东正教、专制制度同民族性结合起来,这本应表明政府的政策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实际上,这第三个成分是农奴制的欲盖弥彰的别名。无怪乎乌瓦罗夫要强调他的“体系”三个组成部分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在拟定和宣传“官方民族性理论”中,M.波戈金和C.舍维廖夫起了显著作用。他们在阐明这一理论的基本原理时断言,俄国全部历史就是俄国社会忠于这三者的证明。他们声称,俄国历史的过程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历史发展明显不同,那些国家在几个世纪当中都在进行尖锐的内部斗争。西方国家是在一个民族被另一个民族征服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俄罗斯国家则是由于自愿邀请瓦兰人到罗斯来才出现的。波戈金声称:“瓦兰人到

① A.B.尼基坚科:《日记》,第一册,列宁格勒,国家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一七四页。

② M.列姆克:《尼古拉时代的宪兵和俄罗斯文学(一八二六——一八五五年)》,圣彼得堡,一九〇八年版,第八十三页。

我们这里来，不是作为战胜者，而是作为自愿选定的人来的。”^①他认为，“这一点是俄罗斯国家在开端和起源上不同于其他欧洲国家的第一个重要差别。”^②

按照波戈金的意见，俄罗斯国家的其他重要特点——各阶层的不同构型，阶层之间没有“纠纷”，权利同享等等——也是从这里来的。波戈金为了论证自己的思想，直接篡改历史事实，提出各种荒谬的理论；譬如，他断定在农奴制国家能够权利同享，这在当时现实的背景上，实际上听起来像是辛辣的讽刺。

舍维廖夫完全赞同波戈金的观点，他说俄国同受革命思潮熏染的国家不同，保留了自古以来的固定的原则，这些原则就是俄国过幸福生活的基础。他特别固执地指出，似乎内部统一与和谐是俄国社会生活所固有的特点。

“官方民族性理论”是对社会矛盾发展的一种惊慌的反应，是农奴主对于俄国和欧洲革命事件发展的反应。保守的原则同改变社会秩序的思想是明显对立的。保守原则的拥护者希望，巩固“基础”就能排除有害影响渗入俄国社会的可能性。

对“官方民族性”的信徒来说，实质上不存在俄国发展道路问题，因为他们认为将来应当同现在一样，而对斯拉夫派和西欧派来说，这个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按照斯拉夫派(康斯坦丁和伊万·阿克萨科夫兄弟、伊万和彼得·基列耶夫斯基兄弟、A. 霍米亚科夫、Ю. 萨马林、A. 科舍列夫)的信念，从彼得一世时起，俄国就偏离社会生活的独特原则，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

斯拉夫派同那些确认在农奴制国家存在着社会协调和社会

① H. П. 巴尔苏科夫：《波戈金的生平和著作》，第四卷，圣彼得堡，一八九一年版，第七十四页。

② 同上。

和谐的官方民族性理论家们不同，他们把以下论点提到了首位：在接受了错误的思想和生活原则的“有教养的”社会与人民——独特的民族力量的体现者人民——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协调。斯拉夫派经常指出这一点，他们对于从上到下贯穿于尼古拉一世帝国管理体系的警察制度和官僚主义表示否定的——有时是相当强烈的——态度。在批评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时，他们承认舆论和言论自由是必要的。农奴制也遭到了斯拉夫派的否定。霍米亚科夫在《论新与旧》（一八三九）这篇论文中写道：“在我们这个时代，令人厌恶的合法奴隶制，在物质的和精神的所有意义上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难以忍受的，应当共同努力用可靠的方法很快把它根除。”^①

斯拉夫派的社会观点最重要部分是他们关于人民的观点。而且在这方面也表现出他们与官方民族性理论家之间的重要差别。对于后者来说，社会下层、农民只是应受到严格而又警觉的照管的对象，而斯拉派则认为，人民在国家历史的命运中起着重要作用。霍米亚科夫曾说：“……人民是唯一的、永久的历史活动家。”^②

在斯拉夫派看来，人民不仅是民族独特性的保持者，而且是国家内部发展的原动力。在批评有教养的社会摹仿西方文化的同时，他们始终不渝地主张接近人民，接近人民的生活。然而，斯拉夫派认为，基督教的温顺和谦逊就是俄国人民的特点。

斯拉夫派把巨大的希望寄托于村社这一与西方盛行的个人主义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相对立的生活形式。在村社组织中，如同在俄国农民的性格及其世界观中一样，斯拉夫派的理论家

① 《霍米亚科夫全集》，第三卷，莫斯科，一九一四年版，第十八页。

② 同上，第一卷，第三十八页。

们总是强调与“为所欲为”和反抗相对立的宗教道德因素。

从这个观点出发,斯拉夫派仔细研究了俄国整个历史发展,以及这种发展与西方各国所走的道路的根本区别。在他们看来,在俄国历史和欧洲各国历史的基础本身和起源上就有这种区别。阿克萨科夫写道:“所有欧洲国家都是以征服为基础的。敌对就是他们的原则。在那里,政权是充满敌意和使用武力的,它是以暴力在被征服的民族中建立起来的。”^① 为了给自己的理论找到根据,阿克萨科夫同波戈金一起都利用法国历史学家A.蒂埃里在他的《诺曼底人征服英格兰史》一书中所提出的论点。

根据斯拉夫派的观点,暴力建立政权的必然结果,就是西方各阶级和各阶层之间不间断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又使得那里的社会的发展需要通过革命的途径,即借助于“变革”来进行。基列耶夫斯基指出:“欧洲国家通过暴力建立之后,就应通过变革来发展,因为国家的发展无非是作为发展基础的内在因素的揭示而已。”^②

对于斯拉夫派来说,革命的变化是社会解体的同义语。斯拉夫派否定阶级斗争,否定“变革”。他们断定,这种社会发展形式对俄国来说完全是格格不入的。阿克萨科夫声称,俄国是建立在自愿承认政权的基础之上的。“我们的政权是人民所希望的,不是敌对的,但是用来保护的,它的建立是得到人民同意的。”^③ 这种关于王公们负有这个“使命”的站不住脚的理论,成了俄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拥护君主制这一论点的根据。

① 《阿克萨科夫全集》,第一卷,莫斯科,一八八九年版,第十六页。

② 《基列耶夫斯基全集》,第二卷,莫斯科,一九一一年版,第一九二页。

③ 《阿克萨科夫全集》,第一卷,第十七页。

在斯拉夫派的社会观念中,反动的思想同进步的观点奇怪地交织在一起。在不同的条件下,时而把这些方面,时而把那些方面突出出来。

西欧派(T. 格拉诺夫斯基、K. 卡维林、B. 鲍特金、И. 安年科夫、H. 克特切爾等)尽管在某些问题上与斯拉夫派有共同点,但是他们以与他们的“邻居”和对手不同的方法来考察俄国的过去和当代社会。他们所持的出发点是:在各个不同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共同因素和类似的特征占有首要地位。西欧派批判地评价尼古拉一世帝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时,在某种程度上和斯拉夫派一样,也反对警察压迫和农奴制。不过他们无意美化专制制度和君主制。他们与斯拉夫派的理论家们不同,了解君主制和在全国所存在的人民的无权状态之间的密切联系。因此,专制统治遭到了他们的否定。

西欧派赞成和平的和逐步的发展,他们认为发展科学和教育,普及知识是改变社会生活的主要手段。他们把逐步吸收西欧各国所积累起来的文化的道路,把接受西欧已经形成的生活方式的做法看作是进行社会改造的唯一可行的方法。

在这个基础上,不仅产生了对俄国历史过程特殊性的否定评价,而且也产生了不相信俄国独特文化的发展的怀疑主义。斯坦凯维奇写道:“人们何必谋求民族性呢?应当追求人类的东西,自己的东西是不得已而用之……根据人民旧的风俗习惯、旧的行为,杜撰或者捏造人民的性格这意味着想要让他们的童年时代延续下去;请给他们共同的、人类的东西吧!请看,他们更能接受他们所没有和缺少的东西。”^①

西欧派在把教育和知识提到首位的同时,认为个人因素的

^① H. 斯坦凯维奇:《通信》,莫斯科,一九一四年版,第七五四页。

发展在社会生活中具有特殊作用。卡维林写道：“本身意识到自己无限的、绝对的尊严的个人，是人民一切精神发展的必要条件。”卡维林把个人和个人因素的形成看作是彼得一世以来历史过程的全部意义。按照卡维林的看法，个人及其意识的这种发展应当成为俄国所面临的社会生活变化中的主要方面。

与此密切相联的是西欧派对人民在历史过程中，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评价。格拉诺夫斯基写道：“群众，好像大自然或斯堪的纳维亚的托尔^①一样，他们要么是无理性地残酷的，要么是无理性地善良的。他们处在历史和自然双重决定的压力之下因循守旧，思想只使个别人摆脱这种决定。历史的过程就包含在思想所引起的群众的这种分化之中。”^② 这种关于人民和群众的观点，不是格拉诺夫斯基个人所特有的；它是整个自由主义的西欧派的典型特点。

西欧派在其确定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的第一个阶段，是同赫尔岑、别林斯基这两位具有另一种气质即革命气质的人一起出现的。但是逐渐地，无论在否定过时的社会生活形式方面，还是在对待官方民族性理论的拥护者和斯拉夫派保守思想的态度方面，都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西欧派的不彻底性。在关于俄国的现在和未来争论得最热烈的时候（一八四二年），格拉诺夫斯基同波戈金就自己为《莫斯科人》杂志撰稿问题进行了谈判。波戈金就此写信给舍维廖夫说：“礼拜天，格拉诺夫斯基和科尔什来到我这里，商谈《莫斯科人》问题。我问他们：你们能不能严格遵守我们的纲领，断绝不断绝同魔鬼和《祖国纪事》的关系，你们还敬仰不敬仰、尊重不尊重基督教？先生们，请你们考虑考虑这

① 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雷神。——译者注

② 《格拉诺夫斯基文集》，第二卷，莫斯科，一八九二年第三版，第二二〇页。